

雨林弦歌越山海

——章哈剧《乌莎巴罗》的传承密码与文化力量

傅海燕

云南的民族艺术谱系中，傣族章哈说唱是一颗藏在雨林褶皱里的明珠。它既载入了《中国曲艺志》的厚重典籍，又跻身中国剧种的璀璨阵列，岁月流年风雨流转，它始终是傣乡大地上跳动的文化“活化石”。当章哈剧《乌莎巴罗》的帷幕在现代舞台拉开，这颗蒙尘的明珠终于重焕光华。云南省第十八届“新剧(节)目展演”现场，该剧演出座无虚席，让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得到最直观的印证。

作为云南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这部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文化工作团倾心打造、曹平执导、张冉编剧的作品，以傣族英雄史诗为筋骨，以章哈艺术传统为魂魄，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中，为民族戏剧走出了一条“曲艺化传承+跨文化输出”的崭新路径。它不是对传统的生硬复刻，也非追逐潮流的刻意炫技，而是让章哈这一古老艺术，在当代文化的坐标系中找到精准的表达落点。

《乌莎巴罗》的故事根系，深植于傣族世代相传的英雄史诗。迦迦国王胸怀一统101个部落的宏愿，以“拉弓招亲”为引，甄选能共襄盛举的盟友。王子帕巴罗挽弓如满月，凭一身超群武艺赢得公主乌莎的倾心，却在征召令前断然拒绝领兵征战。国王面上笑纳这桩姻缘，眼底却已布下罗网，密谋在婚礼之上，一举铲除各部落首领。偏偏信使传递军情时出现差池，一纸错信引爆烽火，让祥和的傣乡瞬间陷入战乱。迦迦王子血染征袍，公主为情殉身，直至金鹿幻影踏雾而来，才终于为这场无休止的厮杀画上句号，让雨林重归往日的静谧生机。

故事的表层，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经典叙事框架，内核却叩问着“战争与和平”这一人类永恒的母题。角色在硝烟中的挣扎、抉择与牺牲，最终都指向“和解宽容”的和平曙光。这种承载人类共同情感的表达，恰好暗合跨文化传播的核心诉求。西双版纳地处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文化交融的前沿，剧作中流淌的和平理念，与“互利共赢”的宗旨天然契合。若未来能踏上东南亚的巡演之路，这部作品必将以艺术为舟，载着多元包容的中国声音，驶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戏剧理论家汪人元曾言：“音乐是戏曲的灵魂，曲调是剧种的魅力。”《乌莎巴罗》的音乐创作，正是牢牢攥住了这一核心。它既让章哈艺术的根基在民间土壤里扎得深厚，又为其接上了时代的鲜活枝丫。演出开场，老章哈玉旺围执芭扇半掩容颜，一段起头甩腔伴着“簏”的悠扬乐声漫过舞台，极具宣叙性的唱腔如傣家竹楼前的晨雾，瞬间将观众裹挟进浓郁的傣乡语境。她所唱的“翠调”，是章哈艺术最鲜明的标识，每一个音符都浸润着独有的民族韵味，仿佛从雨林的晨露中滴落而来。

作曲马辉并未止步于对民间素材的简单挪用，而是将其熔铸成独具个性的“角色曲牌”，让音乐成为塑造人物的生动笔触。王子的唱段以“宫廷调”为韵，巧妙融入东南亚器乐的亮色，既显王室的雍容气度，又藏少年英雄的英武锋芒；公主的唱段采用“二胡调”（又称“椰子漂水调”），旋律如傣家少女轻摆的筒裙般舒缓圆润，将温婉柔情唱进人心；国王的唱段则以“勐海调”为蓝本重构，搭配低沉厚重的男中音与刻意设计的粗犷笑声，一个野心勃勃、心机深沉的形象便在旋律中跃然成形。

传统章哈的音域多囿于八度之内，节奏如雨林溪流般平缓，马辉却大胆打破这一局限：以转调手法铺展旋律层次，用多元配器拓宽表现空间，更借“嘉年华”的音乐风格勾勒特定场景。王子与公主在金湖相遇的段落，旋律里藏着鸟兽欢腾的意趣，象脚踏点如小鹿蹄踏，仿佛将整片雨林的生机与灵动都搬上了舞台。更难能可贵的是对“方言神韵”的坚守。傣语的七个声调比汉语更富变化，全剧以傣语方言演唱，让语言的抑扬顿挫与旋律的起承转合完美贴合。再加之演员精湛的“润腔”技巧，玉琴演奏公主时唱腔婉转如缠枝莲，高承华塑造王子时歌声清亮似山泉，让每一音符生出丰富层次，成功避开了部分民族剧种因过度西化而失却本真的弊病，一开口便是地道的“傣乡声韵”。

章哈艺术的现代转型，从来不是坦途。早年间，曾有创作者尝试将其与话剧、小品嫁接，却始终困在“曲艺附属”的尴尬境地，难以确立自身的独立品格。2022年，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以特效技术拓宽传统戏曲的边界，却始终锚定粤剧唱腔与粤语韵味这一核心。这为地方剧种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深刻启示：形式可以革新，但“核心DNA”绝不能丢。《乌莎巴罗》的创作，正是践行了这一理念。傣语方言的七个声调，搭配章哈“曲头甩腔”基本曲调一曲尾衬腔”的经典结构，共同铸成这部作品的独特“声音标识”，成功避开了“失却民族性”的发展困境。这一实践，清晰揭示出民族艺术的传承逻辑：“方言+特色音乐”是不可动摇的根脉，形式创新则是滋养生长的枝叶。唯有扎稳根脉，才能在现代审美语境中站稳，与当代观众达成情感共鸣；而用傣语演唱傣乡故事，这种看似“小众”的表达，反而因民族特色的鲜明，让跨文化背景下的观众读懂其中共通的情感——对英雄的敬仰、对爱情的珍视、对和平的渴望，这些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从来不会被语言与地域的壁垒阻隔。就像雨林的风，能越过山川，吹到每一个向往美好的

《乌莎巴罗》的破局之钥，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毛小雨研究员指导下确立的“唱演分离”模式：“唱者”以章哈说唱为媒介，承载叙事与传情的功能，其中老章哈更以旁白身份贯穿全剧，将故事脉络与人物心事，都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听觉符号；“演者”则以舞蹈为语汇，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让情感有了具象的表达。这种分工并非割裂，而是形成了“双重情感在场”的独特张力。战争场景中，公主为王子挡剑时的决绝身姿、二人“提线木偶式双人舞”传递的极致悲恸，让演者以视觉冲击直击人心；而唱者感同身受地哽咽与深情吟唱，又从听觉层面加厚情感浓度，让观众的代入感愈加强烈。这种创新，让章哈从“曲艺”真正升格为“独立剧种”；唱者守住了叙事传统的根脉，演者则用现代戏剧手法构建起冲突张力，“局外人”的客观叙事与“局内人”的主观体验相互交织，让剧作既留存曲调的灵动，又兼具戏剧的完整结构。傣族观众称赞它“留住章哈本味，添了舞台神采”，云南艺术学院教授杨军更评价其为“章哈剧立起专属文化语境”，堪称这一剧种重塑的里程碑。

2022年，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以特效技术拓宽传统戏曲的边界，却始终锚定粤剧唱腔与粤语韵味这一核心。这为地方剧种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深刻启示：形式可以革新，但“核心DNA”绝不能丢。《乌莎巴罗》的创作，正是践行了这一理念。傣语方言的七个声调，搭配章哈“曲头甩腔”基本曲调一曲尾衬腔”的经典结构，共同铸成这部作品的独特“声音标识”，成功避开了“失却民族性”的发展困境。这一实践，清晰揭示出民族艺术的传承逻辑：“方言+特色音乐”是不可动摇的根脉，形式创新则是滋养生长的枝叶。唯有扎稳根脉，才能在现代审美语境中站稳，与当代观众达成情感共鸣；而用傣语演唱傣乡故事，这种看似“小众”的表达，反而因民族特色的鲜明，让跨文化背景下的观众读懂其中共通的情感——对英雄的敬仰、对爱情的珍视、对和平的渴望，这些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从来不会被语言与地域的壁垒阻隔。就像雨林的

2022年，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以特效技术拓宽传统戏曲的边界，却始终锚定粤剧唱腔与粤语韵味这一核心。这为地方剧种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深刻启示：形式可以革新，但“核心DNA”绝不能丢。《乌莎巴罗》的创作，正是践行了这一理念。傣语方言的七个声调，搭配章哈“曲头甩腔”基本曲调一曲尾衬腔”的经典结构，共同铸成这部作品的独特“声音标识”，成功避开了“失却民族性”的发展困境。这一实践，清晰揭示出民族艺术的传承逻辑：“方言+特色音乐”是不可动摇的根脉，形式创新则是滋养生长的枝叶。唯有扎稳根脉，才能在现代审美语境中站稳，与当代观众达成情感共鸣；而用傣语演唱傣乡故事，这种看似“小众”的表达，反而因民族特色的鲜明，让跨文化背景下的观众读懂其中共通的情感——对英雄的敬仰、对爱情的珍视、对和平的渴望，这些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从来不会被语言与地域的壁垒阻隔。就像雨林的

2022年，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以特效技术拓宽传统戏曲的边界，却始终锚定粤剧唱腔与粤语韵味这一核心。这为地方剧种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深刻启示：形式可以革新，但“核心DNA”绝不能丢。《乌莎巴罗》的创作，正是践行了这一理念。傣语方言的七个声调，搭配章哈“曲头甩腔”基本曲调一曲尾衬腔”的经典结构，共同铸成这部作品的独特“声音标识”，成功避开了“失却民族性”的发展困境。这一实践，清晰揭示出民族艺术的传承逻辑：“方言+特色音乐”是不可动摇的根脉，形式创新则是滋养生长的枝叶。唯有扎稳根脉，才能在现代审美语境中站稳，与当代观众达成情感共鸣；而用傣语演唱傣乡故事，这种看似“小众”的表达，反而因民族特色的鲜明，让跨文化背景下的观众读懂其中共通的情感——对英雄的敬仰、对爱情的珍视、对和平的渴望，这些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从来不会被语言与地域的壁垒阻隔。就像雨林的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传播历程，为《乌莎巴罗》的文化输出提供了有益镜鉴。这部史诗，在东南亚演出《拉玛坚》等本土化版本，在云南更留下了珍贵的傣文译本。而《乌莎巴罗》拥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西双版纳州漫长的国境线，不仅是地理边界，更是文化纽带，傣语与泰语的高互通性，傣族与东南亚诸多民族在精神世界、生活习俗上的深厚联结，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天然土壤。

云南文投集团打造的《吴哥的微笑》，在柬埔寨驻场演出十载，以“文化IP+产业运营”的模式实现了艺术与市场的双赢。这一案例为《乌莎巴罗》指明了具体路径。未来，这部作品完全可以借鉴其经验，走出一条“反向传播”的特色之路：先以“演出+旅游”的形式，让东南亚游客走进云南，在竹楼与雨林间感受傣文化的魅力；再以成熟的作品形态赴东南亚巡演，用契合区域需求的和平叙事，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这种“引进来+走出去”的模式，既能让章哈艺术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又能让其成为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文化载体。

从雨林深处口耳相传的章哈说唱，到登上省级展演舞台的《乌莎巴罗》，这部作品的价值远不止艺术形式的创新。它以鲜活实践证明，民族文化不必为迎合主流而“削足适履”，守住自身根脉、主动对接时代，便能在本土扎根，更能跨越山海走向世界。云南需要更多《乌莎巴罗》这样的作品。它们扎根民族沃土，萃取人类共通情感，以艺术为桥，将鲜活的民族故事转化为世界能懂、能认同的中国声音。而章哈剧的传承发展之路，也为民族艺术提供了宝贵启示：唯有坚守本真、拥抱时代，古老文化遗产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绽放光彩，让雨林弦歌真正越过山海，回响世界。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文艺新观 合办
邮箱：ynwyp1@126.com

走进怒江大峡谷

——简评刘建华的《魂系峡谷》

张永权



在神奇壮丽的三江并流地区，怒江大峡谷以俊美的自然风光、多彩的民族文化而引人注目。曾经，因地理阻隔，交通不便，这里的人民长期陷落后。在这个背景下，作家刘建华为记录和书写这一地区的真实变化，曾多次进入怒江大峡谷，以一名作家的敏锐目光与形象思维，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大峡谷的自然山水和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写出了地理文化散文集《魂系峡谷》。

散文集《魂系峡谷》由《沧桑记忆城》《遥望石月亮》《传奇飞来石》《悠悠片马情》《风雪独龙江》《古道马帮来》等30篇散文组成。这些作品独立成篇，可作为了解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人文风光、民族风俗的佳作单篇阅读。如在《遥望石月亮》《佳节第一湾》《传奇飞来石》《歌吟百花岭》等地散文，怒江州独有的自然地理景观，让人惊叹。呈现怒江州各民族保卫祖国疆土，维护祖国统一的作品《悠悠片马情》《勇者刀杆节》等，读来让人感叹。

一生守望的精神家园

张旗

回顾往事，发现人生所有的相遇，其实都是为了帮你实现人生的圆满。

1951年，新华书店落户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书店设在古镇州城南街，和县文化馆在同一个院子里。那一年我7岁，刚好开学入小学。那时，我和祖母去赶州城街。祖母就在南街摆摊，出售农产品。摆摊没我的事，我就溜进文化馆借小人书看。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新华书店代销处——两条板凳三块木板搭的摊子，出售新书新报刊。

两年后，代销处改为“新华书店宾川支店”，迁至州城西街南侧，铺面面临，在一坊瓦屋后楼的底层。白底红字的木牌上，繁体行书“新华书店”4个大字，神采飞扬。我记得父亲在那里给我买过一本《人民日报》，奖励三年级期末考试名列榜首的我。海报封面上端面的是一只展翅飞翔的白鸽；白鸽下，是天安门广场浩浩荡荡的欢庆队伍。照片是彩照。封面题为《和平的天安门》。1950年，为纪念社会主义青年会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特意挥毫，画了一只昂首展翅的鸽子，诗人聂鲁达把它称为“和平鸟”。鸽子是那个时代人们追求和平的象征。

我曾生活过的古镇州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新华书店的两处旧址，至今仍在。

1954年，我到州城完小上学，从此，新华书店就成了我学生时代时常光顾的图书馆、阅览室。究竟在那儿买过多少书，我大体上还是记得的，毕竟那些书都是我当年的心爱之物。时光流逝，时代变迁，它们大都已淹没散佚了。让人感慨的是，在我的数千册藏书，现在还能找到一本青年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影响了我一生的那本《高尔基的青少年时代》，却再也无法找到。只知道这本书是根据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写成的。谁改写的我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封面的上半部分画着一艘大轮船，停靠在一条大河边，河上挤满了大小船只，那里是俄罗斯的母亲河伏尔加河畔下诺夫哥罗德市的港口。高尔基就是在这个坐落在伏尔加河畔的城市里度过了他童年最有趣而忧伤的童年，随后又从这里启程，沿着宽阔的伏尔加河走向百态的人生。

我喜欢的书，同一种版本，有我购置了两套的。比如，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套放在枕边，一套藏于书橱。同一外国名著，我喜欢购置不同的译本比较阅读。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刘辽逸译本和草婴译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有高长荣译本和范译译本；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我购置了三个译本，张秉衡译，蓝英年、谷译译和力冈、冀刚译。经典是博大精深的，阅读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还有文化差异、语言节奏等等。

1956年，新华书店迁往牛井。铺面三间，仍然是土木结构瓦屋面的老宅，就在下窝铺往南，牛井中心街的下段。那建筑至今还面目沧桑地守望在那里。每当我从它身旁走过，我都会向它行注目礼，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它，多少往事随之涌上了心头——1958年，我们在新村坡劳动，那天，有位同学在县新华书店

又如书写怒江州风俗的《神奇丙洛》《古今石门关》等作品，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让人目不暇接。而在《沧桑记忆城》《生死系溜家》等篇目中，作者通过对怒江州场景式的扫描和典型事例的展示，寄情山水，关心群众，引人共鸣。这些单篇散文后，都附有怒江大峡谷历史文化、人物景观等内容的解释，像一本百科全书，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文献价值。

围绕“魂系峡谷”这个主题，这些单篇散文就像一棵大树的枝叶花果一样，构建出一个全面立体的怒江峡谷形象。可以说，这部书是由30篇散文作品组合成的有关怒江大峡谷的长卷生态文化散文。身为作家，刘建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遵循着散文创作的规律，有感而发，把“我”融入他书写的人物故事、山水风光和民族精神中，达到情景交融、精神相融的境地。作家丹增在评论刘建华写“香格里拉”的文章时说：“刘建华在作为一位作家的同时，他更是一位人民公仆，除了拥有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之外，他还具有职业习惯的理性思维。”把散文作品的文学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这也是散文集《魂系峡谷》的特点。

散文集《魂系峡谷》还插入了作者在怒江拍摄的大量图片，是一本图文并茂、图文并茂、图文并茂的作品集。怒江山水的图片境界，与文中的文学描写相呼应，令人拍案叫绝。马帮在茶马古道上运货物的惊险图片，与古道马帮的传奇故事图文并茂互补，读者似乎随着作家的笔调，走进了茶马古道的艰难岁月。这些既有文字生动精细的描写，又有图片的真实记录，让这本《魂系峡谷》更显真实艺术魅力。

多声部的成长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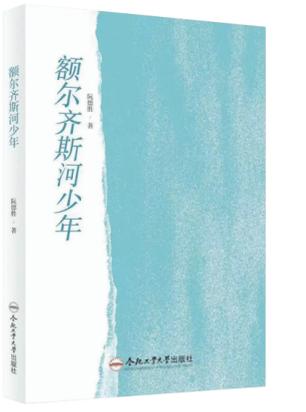
——《额尔齐斯河少年》读后

刘建东

《额尔齐斯河少年》是一部典型的儿童成长小说。但是与惯常的成长小说不同，阮德胜这部小说融入了更多成长元素，把历史、民族、自然、精神等诸多能影响一个少年成长的成分加入进来，汇成一个多声部的交响组歌，让我们看到了一部充满异质的小说。作家把写作的地点放在了有着深厚民族文化积淀的北疆，它具有杂糅的叙述背景，但同时，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又如同当地一览无余的风景一样，清澈明晰，特征鲜明。

多重元素的加入，加深了小说本身的思想厚度和高度。描写儿童少年的成长，大多是单线条的，单向度的，空间是有限的，指向性也一目了然。这部作品中，作家并没有局限于固有的写作模式，并不满足于写一个简单的成长故事，而是让简单变得复杂，让单向变得多向，让有限变得无限。而这种复杂性的获取方式，也把故事本身变得足够丰满、足够圆润，把人物成长所需的养分准备充分。很明显，在选择故事的时代、地域、文化背景上，作家用心良苦，试图从文学的土壤中去深度开掘在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的成长道路上，到底能有多少资源和素材可供其耕耘并有所收获。所以我们看到了作品书写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在即将迎来曙光的黎明时刻，一个少年成熟起来，慢慢地开始考虑什么需要他来坚守，什么值得去努力。在多元民族的新疆北部，也让少年懂得了多民族之间的友情多么珍贵，而自己民族的记忆是多么悠久而深刻。在冰天雪地的考验中，寒冷、饿饿、洪水，既构成了自然的雄浑之力，又成了推动少年快速成长的催化剂。所以，这部成长小说写自自然，自然残酷而温情；写历史，历史宽阔而向前；写民族，民族包容而热情。在多重元素的共同作用下，小说的广度深度都得以增强，小说的思想有了根基，并茁壮成长。

多重元素的互相交融，成为推动人物形象发展的重要力量。小说主要书写了一个维吾尔族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在父亲因为抢救俄罗斯专家而遭遇不幸之后，面对自己个人和家庭命



运的抉择，面对两个少年朋友和俄罗斯专家莫洛斯基耶维奇的友情，面对自然的挑战，勇敢地承担起责任的故事。少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褪去天真、单纯、懵懂，这是一个少年的告别演出，也是一个少年的成人礼。而小说设置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故事节点，似乎也预示着少年的进步。在去往姐姐家的路上，大雪、恶狼，让独自一人的少年知道了以后人生的漫长与险恶，只有冷静地应对，才有可能战胜内心的恐惧，战胜自己的幼稚，才能收获勇敢与坚毅，才能像伟岸的父亲一样，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世界。他的成长得到了老师魏家固、俄罗斯专家莫洛斯基耶维奇的鼓励和滋养，使他知道了国家这个概念，知道了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无意地卷入了国家稀有资源的保护与爱国之间的艰难抉择时，少年的爱国情怀占据了上风。这是少年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小说着力刻画的另外一个人物是俄罗斯专家莫洛斯基耶维奇，他虽然对少年的父亲的死亡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不逃避，正直善良，有良好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少年对稀有矿产的认识从无知到了解过程中，在少年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是典型的正义的化身，是一

个理想化的人物形象。而另一个人物伊琳娜则相对复杂一些，一方面她美丽善良，热情奔放，有着人性美的一面，但在对中国资源的认知和选择上，与莫洛斯基耶维奇的观点不一致，她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当然无可厚非，但站在作家和小说本身的立场上，她又是对立的。而她的存在，也使小说更多元，人物更可信。

多重元素的碰撞，打开了小说的叙述空间。随着多层次意义的扩展与延伸，随着不断加入的新情，展开故事和人物的最重要的叙述显得尤为重要。这部小说整体的叙述风格是偏向于浪漫的，散发着浓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同时又兼具自然人文关怀。额尔齐斯河，可托海，阿尔泰山，它们时而安静，时而咆哮，在作家富有激情的语言文字之中，成为展开浪漫画卷的浓液油彩，为小说的整体色调涂上了明亮而宏阔的基调。而小说中几位主要人物对前途命运的思考，对国家的热爱，对自然的崇拜，也在无形之中，给小说的思想架构增添了希望，奠定了基调。

当然，这还是一部英雄主义的赞歌。“英雄”是这部小说主题的主题，小说的指向就是要塑造一个少年英雄。从主人公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少年的父亲沙吾提·谢木谢尔，到俄罗斯专家莫洛斯基耶维奇，老师魏家固，他们无一不是在中外反复提到“雄鹰”。父亲、专家与老师从小说的开始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与思想主体，只有少年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在自然的熏陶下，在命运的驱使下、在自己不懈地努力下，慢慢地变成一个个真正的男人，蜕变成一只真正的“雄鹰”。“雄鹰”不是一天两天练成的，小说可贵之处就是为我们提供了“雄鹰”成长中的种种细节——到底是什么促使他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是他经历的苦难、磨难、考验与学习的每一个难得的收获。

一个少年的成长既是文学中的，也是时代中的，但温润的文学给成长披上了绚丽而亲切的外衣，让文字可以在想象之中，真实地驰骋于阿尔泰山下、额尔齐斯河畔。

《掌上花园》出版发行



作家王国华的散文集《掌上花园》，由深圳出版社出版发行。

《掌上花园》写了王国华在深圳观察到的215种花。作家要么凑近花与之对视，要么俯下身倾听花语，写作时或临摹其状，或描绘其态，不追求成为百科全书，只想把自己所看到、所理解、所牵挂的花写出来。这些花或活泼，或沉静，或淡然，或跳脱，成了一个有灵性的生命，读来如故友相逢，似知己谈心。表面写花，实则述己。读者读到一朵朵花，看到的却是作家内心世界的万千一隅。

王国华，河北阜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城愁”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曾获冰心散文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散文金奖等。已出版各类作品30部。张雪飞

《云大与西南联大》出版发行



由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撰的《云大与西南联大》，近期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大与西南联大》围绕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在学科发展、民主运动、师资互聘、学缘交集等方面的深层联系，探讨两校如何以教育救国为纽带，在民族存亡之际共克时艰、同铸高等教育精神高地。该书不仅展现了西南联大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丰碑”的历史底蕴，也折射出云南大学作为地方高校在近代高等教育中的独特贡献。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的合作不仅承载着战时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更彰显出中国近代大学在逆境中求存、在困顿中图强的历史底色。张雪飞